

# 胡乔木国史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鲁书月著《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读后

曹守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4.01.039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4)01-122-06

作为国史研究事业的开创者,胡乔木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成为最早开展新中国历史(简称国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在20世纪八十年代又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推动国史研究的发展,促进了国史研究的复兴。胡乔木作为“党内第一支笔”,不仅是新中国辉煌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除了继续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外,还承担起主管新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任,见证和参与了诸多新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意识形态事件,无论从经历,还是学识看,胡乔木都是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式”(程中原:《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乔木》,《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的人物。因此,深入挖掘胡乔木对新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国史理论问题研究的特点,对于今天的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针对性。鲁书月教授的新著《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版 以下简称《晚年思考》)就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新锐之作,具有以下特点。

## 一、《晚年思考》一书作者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研究视野涵盖整个新中国前40年的历史,研究多着眼于对理论界争论热点问题的回答,具有较强的现实感

《晚年思考》一书中的观点多是就理论界、史学界争论的较多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对带有思潮性和倾向性问题的回答。关于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胡乔木是最早进行学术性研究的学者之一。一个时期以来,这个问题再次成为各方争论的问题,《晚年思考》一书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梳理彰显了胡乔木相关探索的现实价值和学术史意义。作者还发掘了胡乔木善于联系的特点,阐发了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打通进行研

究的学术价值。作者认为把新中国40年的历史看成是“两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的历史,把新中国四十年取得成就的原因归结为20世纪五十年代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观点,以及“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等一系列观点,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加深理解,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同样,这一认识,对我们正确理解习近平在2013年1月5日讲话中所提出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作者还指出胡乔木是“较早地论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页101)的学者,对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其目的都是为了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提供理论的依据。这些新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页102)这就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理论探索的角度,为人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提供了新颖视角。《晚年思考》对这些问题的发掘,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提出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感到国史理论的发展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经过国史、党史工作者艰难的跋涉探索、无畏的思考追求。这里面,毛泽东的探索最为持久和深入,给后人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者指出:“胡乔木还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为了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而犯的错误的,属于探索中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西方的现代化建设之路,我们不能采用,而苏联又变成了修正主义,他想探索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又有别于苏联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和

[投稿日期] 2013-12-30

[作者简介] 曹守亮(1976-),男,山东费县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建设新路，但失败了。”（页 83）这是一条荆棘密布而又险象环生的探索之路，正是因为它的艰难曲折才使我们后来的认识更加深刻辩证，才更应该对探索之人给予深深的敬意和理解。如果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革”中的探索失败是一个“悲剧”的话，那么国人对其不理解，乃至侮辱谩骂，直到今天否定毛泽东的观点仍然不绝于耳的事实，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极而言之，最终也将会成为中华民族的“悲剧”。正是因为有了对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晚年思考》一书才提出“为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创立可以与毛泽东思想并称的邓小平理论”奠定基础。这样就能使我们对国史理论中一些重大问题在认识上更加丰满、在理解上更加深刻，在运用上更加得心应手。

《晚年思考》对胡乔木许多思想的发掘是为回应当前国史、党史研究领域中一些倾向性思潮而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评价研究是一个典型。20世纪80年代，针对主张“退回到新民主主义时期”思潮，胡乔木对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再研究，给予了再评价。该书指出：“胡乔木对三大改造的分析采用了科学的历史的方法，也就是采取把这些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观察和分析的态度”，“既指出了实施这种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也实事求是分析了它的不足和问题，也没有因为这些不足就否定它的重大意义。”最后，胡乔木指出中国后来犯了二十多年的“左”倾错误，其原因“不在于三大改造的迟与早，快与慢，而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又选择什么样经营管理体制才是主要的原因。”（页 114—115）至此，《晚年思考》对这种主张“退回新民主主义”或“退回资本主义”思潮的实质也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如果否定了三大改造，像有些人主张的我们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或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导致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如果否定了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首先承认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的前提。”（页 115）“如果像有人主张的中国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没有今天我们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与之相对应的理论体系。同样，如果我国退回到资本主义，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问题就值得怀疑。三年国内革命战争，死了那么多人，为了什么？人们必然会说，

要知今日何必当初。”（页 149）理论与现实联系之紧密，可见一斑。这一思潮的意识形态诉求据定了胡乔木理论辨析的严肃性和必要性。胡乔木针对这个问题，从新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多次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根本的客观事实，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尽管这些刚建立的制度还需要完善，但毫无疑问，它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并且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页 133）这种以由反思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失误从而走向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主张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为根本目的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道路上去的思潮直到今天仍然很有市场。《晚年思考》一书迎难而上，通过分析胡乔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了论争和分歧的理论实质和现实旨归，厘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与改革开放的模糊认识，体现了作者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追求。

## 二、《晚年思考》重点阐述了胡乔木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史的方法论实质，具有思辨性和灵活性

胡乔木之所以能够比较科学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在于确立了对社会主义要全面研究、全面认识的思想，“要确立面对现实的思想，不能用马列的言论和设想来检验社会主义的实践”。（页 136）作者又指出了胡乔木对此所作的解释：“所谓面对现实，一是要承认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这个现实，任何否定这个现实的做法都是不允许的；二是要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社会主义所做设想的修正，反对那种只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曾经说过的话来检验社会主义实践，对一切修正进行非难的‘左’倾错误。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面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面对改革开放的现实，承认改革开放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点和设想的修正与发展，而不能用马列的言论和设想质疑和非难改革开放政策的性质。”（页 132—133）应该说这是当时学术界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同时也是关于实践与社会主义理论关系的一次深刻阐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样也就对正确评价改革开放政策找到了辩证法的依据。作者指出，胡乔木在1986年又一次重申：“科学社会主义决不能一字不差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论述去实现。否则，就不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

仍然只是一种设想了。”(页133)这种探索将理论放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视作历史性的不断发展的思维过程,进而也就为正确认识理论和当前的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1989年,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首次提出的两个发展趋势论则可以看作胡乔木以唯物辩证法研究国史的典范。《晚年思考》一书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一新的概括突破了过去比较简单化的路线斗争模式,摒弃了那种容易走向极端化的思维模式,为更全面、更客观地反映党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新思路,因而得到党史界普遍的认可和赞誉”。(页57)之所以作出上述评价,在《晚年思考》一书的作者看来,对这二十年党的历史作出准确的描述不易,唯物辩证地剖析其形成原因更不易,而最难的却是如何理性地阐释这段历史。因而,在胡乔木提出两种发展趋势观的时候,他们认为“胡乔木两种发展趋势观的提出,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在这方面胡乔木作出了先驱者的贡献。是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科学的分析方法。”(页56)《晚年思考》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自觉地用这种方法去分析胡乔木思想的演变,对比了两种路线斗争论与两种发展趋势论的优劣得失,反映出作者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国史的自觉。“在1950年代初,胡乔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他是运用两条路线的模式来分析党的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对中共党史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又过了三十年之后,到了1980年代末,胡乔木与时俱进,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中共历史发展的现实,勇敢地抛弃了对中共历史影响深远的那种分析历史,记载历史的方法,又最早在党史界提出了党内思想存在两种发展趋势的观点,并用它来解释1958至1978年二十年的党的历史。”(页56—57)这一分析使得读者看到了胡乔木思想中的变化发展、不断扬弃、积极进取的一面,同时也让人对胡乔木思想中不变的方法论:即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实质,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的另一方面。如果说胡乔木提出两种发展趋势观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国史的典范的话,那么《晚年思考》一书在将这一理论范式运用于国史研究方面也带有鲜明的自觉,并作出了上述富有说服力的尝试。

### 三、《晚年思考》揭示了胡乔木研究新中国历史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

早在1978年胡乔木已经就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了细致的思考,并且正式提出了研

究新中国历史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晚年思考》中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新见解、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新认识、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对“党内斗争”、“路线斗争”的新主张等从理论的高度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而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评价、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观的反思、对“文化大革命”的评析、对中共犯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剖析等则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对“文革”原因的辨析,《晚年思考》一书着重分析了胡乔木对其思想根源的揭示,体现了《晚年思考》一书所追求的“研究新中国历史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研究者指出:“对于国内外实际情况研究很少,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很少,这不能说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这是整个党中央,以及我们整个党都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晚年思考》认为毛泽东所犯错误的理论认识根源在于:“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页82、83)既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没有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现成经验,既然机械摘取和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句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挫折和损失,那么在此基础上,胡乔木面对现实,顺应历史潮流,开始的新思考,也就是痛定思痛之举。

将“文革”原因的辨析上升到反省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这是胡乔木的一大理论贡献。《晚年思考》一书对胡乔木相关思想的归纳如下:(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但绝不是“始终存在”。(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根本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三)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四)社会主义社会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正确与否的评判标准是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页26—34)这些认识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观点深化了一大步。基于此,《晚年思考》一书才指出,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认识是建立在对十年“文革”和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的,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历史上没有解决”,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面临的新问题”(页26)。重读胡乔木的这些思想,能够使读者深深感受到源自现实的理论的恒久魅力,这对于当下不断有

人主张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调和论、社会各方共赢论、社会和谐论等观点也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关于改革开放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胡乔木认为：“改革开放政策摆脱了长期流行的一些传统影响的束缚，修正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一些论点和设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而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不但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获得了强大的基础，而且成功地使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页 134）这一论述表明：改革开放政策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又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本身不宜简单划等号，它是介于理论与实践的中间层面，是沟通理论与实践，检验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关键。因而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胡乔木还是尝试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特征作了归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了探索。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由胡乔木负责起草的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区分开来以及关于转入和平发展时期仍然存在革命并且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等三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三个观点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个要点一起，“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年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更是对已往种种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严重教训的深刻总结”，事实上也是对“正处于酝酿之中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初步概括”。（页 143）《晚年思考》指出，也正是通过这一方法，站在这样的认识高度，胡乔木才能够提出将“文革”运动与“文革”时期、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区分的观点。理论的生命力和鲜活性来源于翻天覆地的社会实践再次得到了证实，这也就在事实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方法论。这一思想在江泽民给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 四、《晚年思考》一书阐述了胡乔木国史研究中具有的自我反省意识，增强了胡乔木研究，乃至国史研究的理论色彩

《晚年思考》一书无论是从理论上对“改革开放前中共社会主义观的反思”，“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再思考，还是新时期“对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新思考”，“对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新见解”，均着力展现胡乔木本人的自我反省，带有鲜明的自觉反省意识。

《晚年思考》一书指出，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所发挥历史作用的认识，充分体现了胡乔木自我反省之深刻。这本书“也存在着过分地把党史作为政治宣传品”的弱点，“在一定程度上给以后的党史研究带来了以论代史、史从论出的消极影响”（页 243），“1950年代胡乔木的《三十年》写作的一个特点就是突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丰功伟绩，而对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的党的其他领导人以及广大的革命群众宣传的也很不够，对与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介绍、研究和宣传的不够”（页 251）。“他（指胡乔木——引者注）再一次自谦说他那本小册子（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枯燥无味，非常惭愧。他还认为，党史要有名言轶事，有人物描写。像司马迁的《史记》，将刘邦、项羽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之流传下来。”（页 253）可贵的是，《晚年思考》一书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特点：即用“引用毛泽东等革命导师的论述来代替史实的论证”作了深刻的分析：作者指出：“借用经典作家的论述来进行理论分析，往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有某些合理性。但科学研究贵在独立思考，不能用经典作家的论述来代替自己的独立思考”，“《三十年》开建国后中共党史研究引经据典的风气，这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值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页 254）《晚年思考》从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定位、内容、语言、撰写方法、学风等方面全面展现了胡乔木所作的反省，反映了胡乔木国史研究的深刻和自觉。1986年前后，胡乔木对中共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了反省，得出了尽管“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页 98）的认识。“晚年胡乔木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分析和反思，为新时期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启迪。”（页 109—110）深刻的自我剖析显示了胡乔木晚年已经站在了理论的制高点，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自信。

#### 五、《晚年思考》一书在充分阐扬胡乔木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远见卓识的同时，对其理论的局限性也作了冷静地分析，体现了研究者秉笔直书的良史品格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他（胡乔木——引

者注)曾经努力地追赶这个时代并对社会深刻变革给以理论的说明,他也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消极影响甚为忧虑并努力想尽可能缩小这种影响,但不都是成功的”(页5)这一评价充分说明了胡乔木和胡乔木理论的历史性和有限性,表明作者对这个问题具有清醒的认识。《晚年思考》认为还有必要对胡乔木晚年思考中“可商榷”的问题作一深入的分析。该书在“余论”中指出,对“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批评和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胡乔木对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性认识不足。在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关系问题上,较注重区别,而对借鉴后者积极作用稍显不够。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中,过分政治化影响了理论探讨的正常进行。这都表现出了作者尽管对研究对象给予了赞许和肯定,但终究还是保持冷静的研究意识和批评理性。对胡乔木有关“共产主义渺茫论”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作精神文明建设指导的评价,反映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作者指出:“在中共十三大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之前,胡乔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处在矛盾状态的。这主要表现在1980年代初期,他对‘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批判上,这个批判本身就说明胡乔木对这个问题认识的矛盾。”(页183)“胡乔木提出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是有急于求成的一面。这也表现在1980年代初,他对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批判上。批渺茫,就是认为不渺茫,或者说,还不是太远,远得望不到边,这也表明了胡乔木还没有在灵魂深处彻底摆脱急于求成的思想。”(页213—214)作者之所以作出上述的批评,是因为在今天看来:“‘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不吻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以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页213)作者的这一分析可以说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在指出了上述局限之后,作者又给予了充分理解:对胡乔木来说,提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绝不是说我们现在又要刮什么“共产风”,而是“要倡导一种精神,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既搞好改革开放,又使共产党人远大的理想得以保持,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得

以发扬”。(页215)在这里,《晚年思考》一书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倡导共产主义为核心精神的必要性作了充分肯定,而将当时条件下提倡奉献精神是否要用“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来表述的恰当性作了明确的区分。

此外,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看,作为学者和领导者,胡乔木在“某些具体问题的把握和处理上难免有失当之处”,因为“既要考虑党和国家的稳定,又要促进学术的自由展开,胡乔木在这方面,有时不能说都是做的特别完美。”(页258)一方面,《晚年思考》对胡乔木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也指出了这种过分谨慎和担心的不必要性:“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脆弱到连不同学术思想和观点都难以承受的地步,那倒是真要好好地思考一下了。”(页258)综观全书,读者不难看出作者确实是尽力向着“既指出了胡乔木的理论贡献,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的理论探讨的局限和缺憾”(序言页3)的研究目标不断前进的。当然,作者在研究的同时,抱着非常明确的态度,之所以站在今天理论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高度指出胡乔木理论研究中的“局限和缺憾”,并不是抹杀其功绩,而是客观地向读者展现思想家思维终止的地方正是新的理论发展的起点和基础。这不仅在于说明理论发展的规律性而且更在于揭示理论发展的曲折性和历史性。

## 六、《晚年思考》一书语言流畅而不失严谨、多论断之句,反映出作者较高的语言驾驭能力

关于《晚年思考》一书的语言特色,李良志先生已经作出了恰当的评论,语言的流畅、简洁和写法上的可读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散见于书中的论断之语是该书的点睛之笔,也就是“提神之笔”,是全篇思维的凝练、理论的精华。作者将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概括为胡乔木有生之年的最后一篇力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姊妹篇,这就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推上了新的水平”(页72)。这样的联系反映了作者从整体上把握胡乔木理论的能力。诸如“胡乔木晚年正逢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伟大时代。对深刻变革催生出的新的政治理论给以解答搭建了胡乔木晚年理论研究的平台”(页2)、“他(指胡乔木—引者注)的这些理论研究,既为我国打开新路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稳定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启迪”(页3)等论断,则反映出作者对于理论与现实问题相互作用关系的思考。为此,作者得出“实践丰富

理论，理论指导实践，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错误的实践”（页152）的认识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对理论观点的凝练是抽象思维能力的检验，既是学风朴实的表现，又是研究深化的重要标志。“胡乔木关于对空想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的论述，是当时分析‘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难题的诸多观点中较客观实际也是最具有新意的”（页18）、“毛泽东对马列著作的某些设想和观点的误解和教条化，从而提出错误的理论，是导致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出现失误的原因之一”（页152）、“胡乔木的这些论述冲破了长期以来在研究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思想禁锢，启发大家解放思想，把理论研究引向一个新高度”（页132）等观点再次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对理论的态度决定了人们对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度。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体现了作者党史、国史研究的全局器局。突出了历史人物研究之于国史研究重要性，也就抓住了国史研究的关键。《晚年思考》一书也作出了勇敢的尝试：“根据现有材料，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的高层领导人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第一人”（页147）、“胡乔木是将陈云、邓小平提出的‘二十年’‘左’倾错误这个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第一人”（页49）《晚年思考》一书的历史评价与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改革开放前，中共的主要失误在于过分强调二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引者注）的对立，相对忽视其相融和共通性。在全面实施改革开放后，忽视资本主义消极腐蚀的一面的情况，在部分地区部分党员干部中也时有存在”（页130）、“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与中共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是有很大不同的”（页183）则是作者历史评论思想的突出展现。无论是对于胡乔木思想的认识，还是对于国史事件、人物的评论睿智之见、思维之光都鲜明地体现在这些论断上。事实上，《晚年思考》一书在历史评论方法不自觉地作出了积极探索。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对于如何评价邓小平和胡乔木在正确评价毛泽东这一巨大政治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学界鲜有人作系统的阐述。《晚年思考》一书对这个问题没有回避，给予了正面的回答：“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胡乔木能够忠

实地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和顾全大局的原则”，“在科学评价的具体事实上，胡乔木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页85、86）。“在具体实施邓小平的独特超越的过程中，作为邓小平在思想理论战线得力助手的胡乔木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胡乔木以这个重要《历史决议》的形式，向党和人民，也向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页100）这是值得肯定的大胆尝试。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问题的辨析：如何辨别第二个历史决议中胡乔木的观点。美中不足的是，《晚年思考》一书对胡乔木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和形成过程中所提出一些理论观点（包括被《历史决议》采纳的，也包括未被采纳的）的辨析稍显薄弱。尽管胡乔木有几篇文章已经对《历史决议》作了讲解和阐述，但恐怕仍然代替不了这种梳理和辨析。可能作者是出于已经有专门研究著作（《胡乔木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考虑，所以在这面略省了许多，但文中类似“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辨析就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处理方法。尽管较之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毛泽东晚年错误”影响力要小很多，但对于研究胡乔木理论形成过程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如能在修订时参考《要按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一文的处理，或许能够更清楚地展现胡乔木思想的发展脉络。

很显然，胡乔木晚年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研究这个问题，至少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写作路径来呈现。无论是以时间为线索，还是以文献为纲，都较以问题为核心的论述在难度上小很多。《晚年思考》一书的作者可以说是知难而上，选择这种难度最大的写作路径，不仅试图尽可能避免一般党史、国史研究著作理论性与现实性不能有机融合的不足，而且还尝试着将胡乔木的理论视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结合点来阐述，取得了成功。这似乎也可看作是《晚年思考》一书的最大特点，为国史理论研究取得的新成果。应该说，《晚年思考》一书将新中国40年历史上众多理论问题归纳为五个领域十六大问题加以研究，尽管不无可议之处，但这种尝试对于拓展胡乔木研究的新局面，提升国史研究的新境界，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责任编辑 王云江]